

银屏里的上海
它可以是疯狂的,可以是明快的,也可以是温婉的
.....

疯狂的上海.....



这里面的弄堂——布高里其实还算是好的,如果不是塞了那么多的住户,其实还是非常整齐响亮的石库门。但上海的东西差不多都是本来是好的,但人越来越多地堆在上面,然后是人带来的垃圾,人带来的油腻,自然还有人带来的记忆。

里面一个徐家汇,一个南京路,都是上海喧哗的地方,一个拍的是上午的嘈杂,一个拍得是夜晚的清寂,前面是市井们活得真,后面是香港朋友谈恋爱,苦得假。

里面的小阁楼,小厨房是搭景最漂亮的地方,似乎能闻得到油烟,似乎能听到偷电偷水的街坊心跳声。真实不是复印,而是透过一面斑驳的镜子,熟知的人总能从脑子里拼出最准的图景来。

明快的上海.....

最初看到《夜·上海》这样的题目,脑海里满满的,那个纤细手指间高脚杯里流淌湖泊色液体、微熏微旧的底色、女人盈盈的腰肢在黯淡的光影间游弋、亮红色细细高根嗒嗒作响的旧上海。似乎在很多人的想象里,夜上海就是老唱片支支呀呀的转动,夜上海就是身着旗袍眼神迷离的浓妆女子,夜上海就是老酒吧里举杯的游子和富少。所以这样健康而明快的夜上海,让我吃惊,又感觉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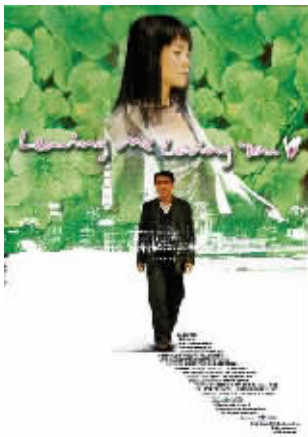


整部电影中,沉默的人激进的人努力的人傲慢的人,所有人走在这个城市里,在这个偶然的夜色里,全部的天真表露无疑。不知道为什么这部电影就让我想到几年前看到的一部日本电影《菊次郎的夏天》。那么简单而满满的爱和活力。

温婉的上海.....

本该人声鼎沸的上海,在片中却安静得宛如童话中的城堡。画面处理的都很美,从一开始的绿意到大城市的全景,再到那个像时空隧道一样的可以看到浦江全景的大洞以及映在洞上的那一簇一簇的烟花。美得很精雕细刻,很上海的风格。

大概一座城市,一座真正的、富有永恒生命力和人文风情的大城市,都应该拥有和这个城市相匹配的影像和故事吧?香港,或者巴黎,或者东京,或者纽约,这样的城市都不用说了。那么上海呢?根据电影的假设,上海的春天,是这样的:两个香港人透过摩天大厦高层的悬窗,欣赏东方明珠电视塔、以及浦江两岸的风景,烟花在夜幕中适时地绽放。



弄堂里的名人



穿梭于上海老城区那些长长短短、或宽或窄的弄堂之间,寻找渐渐消逝的历史印迹,感受旧上海的人文风情——这是时下上海滩悄然兴起的一种时尚。

深邃壮观的城市背景
“弄堂”是上海人对里弄的俗称,“里弄房子”就是弄堂建筑。弄堂和弄堂房子其实是上海开埠后的“土特产”,起初外国人只许中国人在租界里工作,而不允许在租界里居住。后来发现要发挥上海大都市的潜力,仅仅靠那些为数不多的外侨显然是不行的。于是在19世纪五十年代太平天国运动进入江南,大量富有的中国难民要求移入的情况下,租界当局便顺水推舟,将租界向中国居民开放。为了便于管理,就在指定的地块上兴建大批集体住宅。这些房子多为立帖式结构,像兵营一样联立成行,对内交通自如,对外只有弄口抵达马路,弄口设铁门,可以随时关闭。

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原本是为了便于管理而统一建造的集体住宅,很快发展成为综合东西方居住特色的上海弄堂,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成为上海房地产业的中坚。弄堂房子不仅租界里有,华界里也有。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近420万的居民中,除了少数外侨和中国富人住着花园洋房,以及100多万贫民住在城市边缘的棚屋里外,绝大多数居民,包括中国和外侨的一些白领阶层都居住在各式各样的弄堂之中,总面积估计达2000余万平方米。居高俯瞰,满目所及都是一片片栉比鳞次、此起彼伏的弄堂房子的层顶。难怪王安忆在《长恨歌》里说,“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座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

市民社会的一面镜子

建筑是社会生活的镜子,居住建筑尤其如此。在旧时的上海,能住得上弄堂的,至少也是有固定收入者,否则便无法交付每月到期必须缴纳的房租与房捐(或称巡捕捐、绿衣捐)。既然社会是分层次的,弄堂自然也有高中低之别。不同级别的弄堂房子在质量上差别较大,而更重要的差别是地段不同。

弄堂的级别还反映在弄堂里的

弄堂,这一上海特有的民居形式,曾经与千千万万上海市民的生活密不可分。多少个故事,多少个典故,多少个名人,多少个记忆,与石库门,与亭子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没有弄堂,就没有上海,更没有上海人。弄堂,构成了近代上海城市最重要的建筑特色;弄堂构成了千万普通上海人最常见的生活空间;弄堂,构成了近代上海地方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份。



生活与文化之中。“倘若走进住家的弄堂里去,就看见便溺器、吃食担,苍蝇成群地在飞,孩子成队地在闹,有剧烈的捣乱,有发达的骂言,真是一个乱哄哄的小世界。”这是鲁迅先生在《上海的儿童》里对低级弄堂的描写。由于家家户户都是门挨着门,共同分享着屋前屋后的弄堂,如果邻里之间能够相互体谅、相互帮助倒还罢了,如果相处得不融洽,难免会为鸡毛蒜皮的事情生出是非,一不小心还会惹出各种各样的“弄堂风波”来。而在那些沉静而优雅的高级弄堂里,虽然是非比低级弄堂少了许多,实际上人际关系更加冷漠,除了有三五个男孩在那里玩耍外,很少有人在此停步。偶而有三两个人聚在一起低声谈话,也多半是某家的“娘姨”(保姆)和“大师傅”(厨师)。假如哪一扇门忽然开了在迎宾送客,或者有些不寻常的活动时,人们也只是装成漫不经心地遥望着,而不会上前围观,说长道短。人们常说上海人善于处世,门槛精,可能和他们从小就生活在这样拥挤的弄堂里、接受这个小社会复杂的人

际关系教育有关。

亭子间文学的发源地

有些大型的、拥有数百户甚至成千户人家的弄堂,俨然就是一个城中之城。里面杂货店、小吃店、理发店、老虎灶、裁缝店,应有尽有,甚至还有工厂。而上海“弄堂生意”中最具特色的,无疑是那此起彼伏的叫卖声,鲁迅先生在《弄堂生意古今谈》里说,弄堂里的那些叫卖零食的声音既漂亮又具艺术性,使人“一听到就有馋涎欲滴之慨”。此外,还有算命的、化缘的,晚上还有卖炒白果的,夜深人静时,说不定还有令人毛骨悚然的为家中病孩召魂的长嚎声……有意思的是,当时许多为了逃避白色恐怖而躲到上海来的进步文人,大多落脚在此类弄堂的亭子间,并因此产生了我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文学派别——“亭子间文学”。“亭子间文学”并非描写亭子间,而是这些住在朝北的、冬冷夏热的亭子间的文人,在极为恶劣的生活条件下创作出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南昌路解放前叫环龙路,属于法租界。高大的梧桐树和两边各式西洋建筑构成了其独特的风景。因为不通公交车,也非商业闹市,马路很安静。由东往西走的话,在69弄可以停一停,弄内3号曾经是30年代赵丹和叶露茜的住处。当年他们经金山介绍结婚。这幢三层楼的房子是叶露茜的父亲叶舒屏一个医生留给叶露茜母亲的遗产。

100弄2号,是陈独秀的家,也是《新青年》编辑部。1920年陈独秀、李达、陈望道在这里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再往前的136弄也值

得进去看一看,1号曾住过我国文学大师巴金。而弄内11号,是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家。

南昌路以南,那条也是东西向的马路是复兴中路,解放前叫辣斐德路。这里同样是当时文化人聚集的地方。复兴中路196号是幢石库门住宅,曾是中共早期领导人恽代英的住所。再往前走一段,346弄8号,曾住过我国著名画家陆俨少。512号是赫赫有名的大画家刘海粟的故居。隔壁517号,柳亚子曾住过。著名翻译家林淡秋1937年至1942年住在辣斐德路442号。他在此编辑了“孤岛”时期的著名刊物《译》和《每日译报》,并翻译了英国记者贝特兰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的新生》。

在辣斐德路612号,现在的复兴

中路528号第一女子初级中学的校址住过吴凯声法学博士。1933年何香凝曾经聘请他担任过廖承志的辩护律师,最终使廖承志安全出狱。吴凯声即是著名电视人杨澜丈夫吴征的爷爷。

30年代的法租界金神父路花园坊,现在的瑞金二路129弄,也留下不少文人故事。黄源夫妇住在103号的三楼,徐懋庸一家住在106号,1932年曹聚仁也搬到107号。曹和徐都是写杂文的高手,成了邻居后,更是一见如故,谈得投机。徐常常跨过阳台聊天,一聊就是通宵,有时就隔着阳台说话。



弄堂——上海永远的风情